

## 中国向地中海：一种新的视角

Renata Vinci (海风)

**摘要：**本文探讨了中国与地中海地区之间的跨文化关系，特别是在晚清时期中国官员和外交官的视角下。地中海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跨文化空间”，这是一个文化、经济和民族交汇的区域。本文通过 MeTChE (中国视角下的地中海) 研究项目，凸显“去边界化”方法在分析中西关系中的重要性。去边界化的研究视角允许我们超越传统的国家和文化界限，深入理解中国与地中海之间的复杂互动和交流。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文献中有关地中海的描述，我们不仅可以揭示中国对这一地区的认知演变，还能更全面地理解跨文化交流是如何塑造历史进程的。

**关键词：**中西交流；地中海；跨文化空间；旅行文学；晚清

### 一、引言

鉴于地中海在地理、历史、政治和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无论对于古代还是现代世界，这一被视为欧洲的摇篮 (Matvejevic 1999: 10)。几个世纪以来，它叙述为一个卓越的“跨文化空间”，一个拥抱着许多民族、文化和经济的流动区域，因此无法使用传统的国家边界概念和历史学方法去探索和叙述 (Abulafia 2011: xxiii; Braudel 1985: 8)。今天，世界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投资证明了它越来越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虽然欧洲社会普遍承认其象征意义，但鲜有研究试图调查中国人对地中海的看法，探讨其形成、发展和重要性。

面海而居的民族，一直被广泛探讨。然而，我们不能忽视这个特殊海域的战略位置，这个位置对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文明便是中国文明，中国的文献早在汉代就提到了“地中海”。

本文源于 MeTChE (中国视角下的地中海) 研究项目<sup>1</sup>。该项目依赖于地中海学 (Mediterranean Studies) 提供的理论方法，并受益于此前关于中国文献中描述特定欧洲国家和民族的个案研究，旨在探索从宋朝到清朝 (960—1911 年) 期间，中国在地理著作和游记中对地中海形成的看法。该项目试图评估在相关时期内，地中海如何被描述和看作为一个“跨文化空间”。本文旨在通过展示清末中国官员和外交官在游记中对地中海及欧洲国家的典型描绘案例，提供一些关于清末中国对地中海作为“跨文化空间”的认知证据。

### 二、运用地中海学视角探索中西交流

历史学家佩里格林·霍登和尼古拉斯·珀塞尔 (Horden and Purcell, 2006: 723) 提出了将海洋的历史作为重新诠释传统地理学的新视角。这两位学者建议将海洋视为忽视国家边界、颠覆权力等级的政治中立区域，而不仅是地理空间。他们将这一新的历史和地理学视角称为“a new

<sup>1</sup> 本研究项目由“下一代欧盟” (Next Generation EU) PNRR 资助——第 4 任务“教育与研究”——C2 组成部分——投资 1.1，国家研究计划基金和国家重大利益项目 (PRIN)，首席研究员为该文章的作者，由巴勒莫大学与另外三所意大利大学共同开展。欲了解更多关于该项目的信息，请访问网站 <<https://www.unipa.it/progetti/china-mediterranean/en/research-project/>>。

thalassology”（新海洋学），源于希腊词汇“thalassa”（海洋）。这可以被视为地中海在后现代研究模式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初步证据。

被视为地中海研究先驱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以其对地中海地区的广义定义而闻名。根据他的观点，地中海不仅包括沿海区域，还延伸至周围的内陆区域。他对“什么是地中海？”这一问题的著名回答常被引用：

[地中海是]千变万化的事物。不止一种景观，而是无数种景观。不止一片海洋，而是一连串的海洋。不止是一种文明，而是多重文明，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Braudel 1985: 8）。

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与周围陆地的显著联系在其拉丁词源中得到了明确体现：Medi-terraneus（陆地之间）。这反映了穿越地中海的众多民族及其各自语言所采用的不同名称，如罗马人的 Mare Nostrum（我们的海）、土耳其人的 Akdeniz（白海）和犹太人的 Yam gadol（大海）等，在此不一而足。大卫·阿布拉法亚最新提出的“液态大陆”这一定义，旨在将地中海标记为“一个真实的大陆，[它]在一个具有明确边界的空间内包容了许多民族、文化和经济体”（Abulafia 2011: xxiii）。与布罗代尔不同，阿布拉法亚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限定，仅关注地中海的水域和沿海景观，包括其岛屿和港口城市，而忽略了“那些从未靠近海洋定居的传统社会”（Braudel 2011: xxiii）。

综上所述，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和物理特性，地中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样性与统一性共存的地方，在这里，文化差异和国家边界往往是模糊的，形成了一个包容且凝聚的区域。因此，不同民族、传统和文化之间的共存与混合理念，已成为地中海话语的核心主题。

### 三、中国关于地中海的著作

对于面对大海的民族而言，无数历史事件都被视为因地理上接近海洋而直接产生的结果，地中海历史学研究对此已广泛探讨。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片海域引起独特的战略位置，也成为历史上相距甚远的两个大陆文明的重要交汇地。以中国为例，中国文献早在汉代（公元前 202 年—公元 220 年）就提到了地中海，称其为“西海”。这一地名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后来被源自罗曼语族词源的语义借词“地中海”所取代。该名称首次出现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1602 年绘制的世界地图上。<sup>2</sup>与许多其他外来地名在中文中的翻译不同，这个名称在不同文献中变化较小，直到今天仍然是“地中海”的主要中文名称。从这一名称可以看出，地中海是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交汇地（Tomas 2020: 1-6），即一个文化交汇与融合的“跨文化空间”。

宋代是迈向现代化的过渡时期，得益于技术进步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以及商业城市网络的建立，政府更加重视促进海上贸易。由此，中国对外国的兴趣逐渐增加，催生了大量的旅行日志、航海书和地理著作，成为推动印度洋和海上丝绸之路上涌现更多旅行者和增加贸易往来的催化劑。

---

<sup>2</sup> 若要全面了解与该主题相关的中国古代文献，请参阅余太山，《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 年，英文版 *China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A Survey of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13)。

这一时期，商品与信息的频繁交流，其中包括与地中海有关的内容，这一切都得到了来自各国人士的推动。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商人和旅行者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穆斯林社区影响不断加强的中国东南部、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在这一时期，许多涵盖地中海区域，涉及外国和贸易的重要地理著作都是由中国作者撰写的，如周去非（1135 - 1189 年）的《岭外代答》（1178 年）和赵汝适（1170 - 1228 年）的《诸蕃志》（1225 年）。在这些著作中，研究者展示了阿拉伯商人口头传播的影响力，并显示与很多阿拉伯地理学家的作品不少相同元素和叙述，这些地理学家包括伊本·胡尔达德贝（约 820 年 - 912 年）、马苏第（约 896 年 - 956 年）和伊德里西（1099 年 - 1165 年）等（Hirth and Rockhill 1911: 36; Park 2012: 48; Almonte 2020）。

在元朝（1271 - 1368 年）时期，由于所谓的“*pax mongolica*”（蒙古治世），丝绸之路促进了大量人员、商品和知识的流动。在此背景下，蒙古景教僧侣拉班·扫玛（约 1230 - 1289 年）与他的年轻同伴马可（Markos）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之旅，但他们从未抵达目的地。旅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扫玛被任命为巴格达波斯伊儿汗阿鲁浑派往教皇和欧洲国王的使节。这一任命标志着历史性的时刻诞生，因为扫玛成为第一个来自中国、穿越地中海并访问欧洲的旅人，他的行程还包括意大利和法国。他的游记以叙利亚文撰写，是简称为《大总管雅巴拉哈三世及拉班·扫玛传》一书的一部分，是第一份由中国地区旅人撰写的关于地中海的第一手描述（Budge 1928）。与其他宋代文献相似，他对 1287 年埃特纳火山爆发的描述深受阿拉伯图像学的影响，回顾了阿拉伯地理学家加兹维尼（1203 - 1283 年）的描述（Borbone 2008: 227）。

明朝晚期，外来地理文献对中国知识，尤其是关于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国家的影响部分，造成了重大转变。这一变化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抵达中国所引发的。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们的传教活动外，耶稣会士还致力于传播西方知识，旨在向中国展示基督教的意义和优点。分享世界地理信息是他们传教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602 年，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1552 - 1610 年）首次在其世界地图《坤輿万国全图》上引入了关于地中海的简要描述，在此之后，艾儒略（1582 - 1649 年）的《职方外纪》（1623 年）在中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该书不仅被比利时天主教耶稣会修士南怀仁（1623 - 1688 年）在其《坤輿图说》（1672 年）中引用并部分整合，而且在 18 世纪的礼仪之争后，《职方外纪》对世界的描述仍然出现在明清时中国的著作中，如《明史》和《清朝文献通考》，并且继续产生影响。

在 19 世纪，尤其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引入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信息。这一知识传播新浪潮的主角是来自北欧和美国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们翻译、改编甚至撰写了大量关于世界地理的短篇论文和手册。普鲁士新教传教士郭实猎（1803 - 1851 年）的《万国地理全集》（1848 年）和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传教士慕维廉（1822 - 1900 年）的《地理全集》（1853 年；1883 年增订版）为中国文人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以及关于地中海景观、经济和文化的更丰富细节。这些文人随后大量引用，如在于 1848 年徐继畲编纂的《瀛寰志略》、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 年、1847 年和 1852 年）和 1891 - 1897 年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许多由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编写的地理著作，经过中国编辑的改编和修订，成为了首批中国探险者和外交官前往欧洲的必备阅读材料，这些探险者和外交官大多在鸦片战争期间或之后抵达欧洲。受官方职责或个人兴趣驱动，这些中国官员和文人——如斌春（1803 年 - ?）、张德彝（1847 -

1918年)、洪勛(1855年-?)、郭连城(1839-1866年)、薛福成(1838-1894年)、王韬(1827-1898年)和康有为(1858-1927年)——穿越了布罗代尔所描述的“陆海相连的道路”(Braudel 1985: 76-77),即地中海。对于他们来说,地中海成为了通往欧洲的门户。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再依赖于外来信息,他们关于海上航线、地点和城市的描述,以及他们的感受和经历,构成了新的地中海叙事。

对“他者”的发现实际上是通过中国和外国著作之间复杂的知识互动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包括来自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的外国学者的作品,以及中国学者、地理学家、官方使节和旅行者的著作。大多数探索中国文献中地中海和欧洲国家描述的研究,倾向于通过集中于个别国家及其国家身份来系统化这一复杂框架。关于地中海交流,应当对地中海跨文化空间的感知和表征进行梳理,以“去边界化”(de-border),研究中西特别是中欧的接触。这一探索应通过考察共享文化的大系统,强调历史上文明相遇所产生的共同元素来实现。传统文学形象学研究(Imagology)重视“讨论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征的起源和功能,特别是它们在文学作品、戏剧、诗歌、旅行书和散文中的呈现方式”(Beller, Leerssen 2007: 7)。与此不同,我们应当超越民族边界和身份的概念。

#### 四、晚清中国外交官眼中的跨文化地中海

为了强调在审视中国关于欧洲和地中海地区的文献时采用跨文化视角的重要性,本章将提供从晚清旅行日记中提取的例子,这些旅行日记代表了中国对西方观察和互动的最终阶段和最成熟的阶段。

对于最早的中国旅行者和使节而言,地中海是通往欧洲的门户。他们从埃及沿海出发(或在1869年苏伊士运河建成后经过该运河),前住意大利和法国的海岸。因此,海上航线的极端重要性不仅在于便利个人的实际航程,也在于促进知识的交流。这样一来,地中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许多人在促进西方(欧洲)与中国之间知识互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旅行文学中呈现的信息是通过亲身经历收集的,提供了第一手实践资料和信息,与之前几个世纪的情况不同,这些信息不再是西方人文献的转述。相关研究中,康有为(1858-1927年)丰富的日记集可以被视为一种宝贵的调查资源,这要归功于作者融合的文化背景和他在世界各地旅行的丰富经历,这些旅行始于百日维新失败之后。众所周知,康有为在帝国末期成为了一个关键人物。他来自广东省,接受了儒家经典的教育,并通过深入研究大量翻译成中文的西方著作,包括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来补充自己的学识。这种东西方教义和文化的融合使他能够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桥梁,接受并吸收西方思想。

他的旅行笔记收录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一书中,其中只有关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日记已被出版。在1905年《意大利游记》的开篇章节中,他讲述了从埃及的赛义德港出发,沿地中海航行,直到抵达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西。这一章节专门描述了地中海——自1904年6月14日从埃及沿海的赛义德港出发,在整个向西北方向穿越地中海的海程中,他对船上风景的描述与他对古代地中海文化的知识灵感完美结合(康有为 2016: 77-79)。这次旅程还给他提供了创作一首绝句和一首歌曲的机会。这首歌长达63行,是专门献给地中海的,在题为《地中海》的这一章总共约

1200字，充满了对古典、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文明和历史人物的引用，以及对更近代的提及。实际上，在这几页之中，他提到了：

埃及文明、腓尼士文明、腓尼基、亚述、巴比伦、迦太基、希腊文明、罗马、邀厘（Ulysses）、贺梅尔（Homer）、罗慕路（Romulus）、毕固他拉（Pythagoras）、索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亚力山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汉尼巴（Hannibal）、绷标（Pompey）、恺撒（Caesar）、鼐尔孙（Nelson）、拿破仑（Napoleon）。（康有为 2016：77 - 79）

在康有为的叙述中，地中海的各种民族和其著名历史人物汇聚在一起，形成了可以恰当地描述为“文化景观”的画面。然而，这一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耶稣会传教士的贡献，他们在康有为之前几世纪就开始推广古代欧洲文化中学术和学者的卓越。在这一背景下，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对西西里的描述尤其值得注意。他在叙述中讲述了像代达罗斯（Daedalus）和阿基米德（Archimedes）这样的人物的非凡成就和发明，二者都代表了古典地中海文明的深厚知识和遗产。通过研究这一来源，我们可以追溯康有为对他即将遇到和探索的文化世界的迷恋根源：

有巧工，德大禄者，造百鸟能飞，即微如蝇虫，亦能飞。更有天文师，名亚而几墨得者，有三绝：昔敌国驾数百艘，临其岛，彼则铸一巨镜映日，注射敌艘，光照火发，数百艘，一时烧尽。又其王命造一极大舶，舶成，将下海，虽倾一国之力，用牛马骆驼千万，莫能运。几墨得，营运巧法，第一举手，舟如山岳转动，须臾下海。又造一自动浑天仪，十二重，层层相间，七政各有本动，凡日月五星列宿，运行迟疾，与天无二。以玻璃为之，重重可透视。（艾儒略 1996，87）

艾儒略的《职方外纪》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和影响力，因此，它也被频繁引用于各种地理著作和百科全书中，包括南怀仁、徐继畲和魏源等人的著作。作为其广泛传播的证据，我们仍然可以在郭连城 1921 年的旅行记《西游必略》中观察到明显的痕迹。郭连城在 19 岁前直接受传统教育，后来皈依了天主教，并于 1859 年加入了前往罗马的代表团。他在旅行记中对两位希腊发明家的描述，清晰地反映了阿莱尼的言论（郭连城 2003：51-52），这显示了古典地中海文化遗产中的某些主题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长期存在。

此外，地中海文明遗产的文化渗透性也体现在薛福成 1889 年的《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中。在关于罗马尼亚的部分，可以看到罗马习俗和传统的深远影响，展示了古典地中海文化对遥远地区的持久影响：

今罗马尼亚遣使分驻各邦，俨然自立，且其地较丹马、比利时诸国为大。然溯其渊源，实古罗马之遗裔也；其土俗，则古罗马之遗风也。罗马之气脉亦长矣。（薛福成 1985：328）

薛福成强调了古罗马遗产对罗马尼亚风俗的影响，暗示了文化互动从海岸线到东欧内陆地区的延续。这段文章让人联想到布罗代尔对地中海作为一个统一空间的看法——在地中海地区这个

空间中,几个世纪以来,各种文明和文化彼此叠加,突显了地中海周边所有地区之间的历史互动和交流,即使是那些更深入内陆且缺乏直接海洋通道的地区也不例外。

## 五、结论

多元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共存与混合已成为地中海话语的主线。自汉代以来,中国的地理文献和旅行记录显示出对地中海地区的持久兴趣,间接和直接的接触从宋代开始逐渐加强,到了晚清时期更加频繁。通过跨文化的视角审视这些中国关于地中海的文献,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之间丰富的互动、交流与共存。将地中海视为一个“跨文化空间”,我们可以突破国家边界的限制,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与更广阔世界之间历史关系的互联性与复杂性。这一方法为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并丰富了我们对于塑造全球历史的多层次文化遗产的认识。

## 参考文献

- Abulafia, David. 2011. *The Great Sea: A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so/9780195323344.001.0001>
- 艾儒略, 谢方. 1996. 职方外记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 Almonte, Victoria. 2020.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Work Lingwai Daida by Zhou Qufei*. Roma: Aracne.
- Beller Manfred, and Joep Leerssen. 2007. *Imagology.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s: A Critical Survey*. Amsterdam-New York: Rodopi.
- Borbone, Pier Giorgio. 2008. “A 13th-Century Journey from China to Europe. The Story of Mar Yahballaha e di Rabban Sauma.” *Egitto e Vicino Oriente* 31: 221–42.
- Braudel, Fernand. 1985. *La Méditerranée. L'Espace et l'Histoire*. Paris: Flammarion.
- Budge, Ernest Alfred Wallis. 1928. *The Monks of Kūblāi Khān, Emperor of China; or, The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Travels of Rabban Sāwmā, Envoy and Plenipotentiary of the Mongol Khāns to the Kings of Europe, and Markōs Who as Mār Yahbh-Allāhā III Became Patriarch of the Nestorian Church in Asia*.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 郭连城. 2003. 西游笔略.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 Hirth, Friedrich and William W. Rockhill. 1911. *Chau Ju-kua: 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Entitled Chu-fan-chi. Edited,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otated by Friedrich Hirth and W. W. Rockhill*. Saint Petersburg: Printing Office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 Horden, Peregrine and Nicholas Purcell. 2006.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New Thalassolog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1, 3: 722–40. <http://dx.doi.org/10.1086/ahr.111.3.722>
- 康有为. 2016. 欧洲十一国游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 Matvejevic P. 1999. *Mediterranean. A Cultural Landscape*.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 Park, Hyunhee. 2012. *Mapping the Chinese and Islamic Worlds: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Pre-Modern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dx.doi.org/10.1017/CBO9781139088329>
- Tomas, David. 2020. *Transcultural Space and Transcultural Beings*. London: Routledge.  
<http://dx.doi.org/10.4324/9780429269714>
- 薛福成. 1985.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 长沙: 岳麓书社。
- 余太山. 2013. 古代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研究. 上海: 商务印书馆。英文: Yu, Timothy. 2013. *China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A Survey of Ancient Chinese Sources. Sino-Platonic Paper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